

# 《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 对雅安地震报道的比较研究 ——基于框架理论的视阈

石 林

**摘 要：**框架理论为分析报纸的报道模式及倾向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文章分析了《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在研究时段内报道雅安地震的新闻框架，从框架的主题设定、素材呈现和具体文本生产三个层面比较了两报地震报道的异同，指出前者坚持的是“形象框架”而后者采用“情感框架”，二者的结合能够为受众建构一个相对完整的关于雅安地震的现实。

**关键词：**框架理论；《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地震报道

**作者简介：**石林，男，硕士生。（南京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210097）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4) 01-0031-06

2013年4月20日，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里氏7.0级地震。纵观针对雅安地震的报道活动，整体上全国媒体在这场新闻报道战役中都表现得可圈可点，在及时报道灾情、引导社会舆论、鼓舞群众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传统的大众媒介，报纸依然是本次抗震救灾报道的主力之一。本文拟将运用框架理论对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和以《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都市报对雅安地震的报道做一对比性的分析研究。

## 一、研究缘起与框架理论

灾难给了新闻媒体“大显身手”的机会，而透过对灾难的报道，可以窥见不同媒体的新闻理念和价值立场。在历经了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两次大的灾难的洗礼后，在网络自媒体对传统媒体形成极大冲击的背景下，党报和都市报作为传统大众媒介如何对雅安地震进行报道？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报纸对同一起新闻事件的报道有哪些共同点，又有哪些差异？作为受众，又应该怎样体认和理解它们各自的新闻报道？例如，它们对灾难现实的“再现”是否完整？如果存在偏差，背后的制约因素又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理所当然地是国内党报的典范。它的新闻报道和评论代表着党中央的声音，政治性强，权威性高，影响力巨大。在都市报领域，隶属南方报业集团的《南方都市报》无论是从市场价值、报道水平还是媒体影响力长期以来都是国内都市报的佼佼者。研究对象既已选定，就需要借助理论对它们的报道进行分析研究。在传播学中，框架理论是对大众传媒与现实“建构”的关系进行解释的重要理论，适用于本文的研究。

框架理论是探究大众媒体如何根据一定的新闻立场和价值标准，并在此基础上生产新闻文本以“建构”现实的理论。框架的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贝特森提出，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家E·戈夫曼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阐述，戈夫曼在其著作《框架分析》中指出：“所谓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所有我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于一定的框架，框架能使我们确定、理解、归纳众多具体信息。”<sup>[1]</sup>简而言之，框架即“个人或组织对社会事件的主观

解释和思考结构”。20世纪80年代,框架理论被引入到新闻与传播研究领域,并诞生了“新闻框架”的学术概念。

新闻框架是新闻媒体对新闻事实进行选择、加工、呈现的特定原则或准则,这些原则源于媒体的自身立场、编辑方针、与新闻事件的利益关系,同时又受到新闻活动特殊规律的制约。在媒体的新闻生产过程中,新闻框架是必然存在的。记者、编辑等新闻从业者均要按照媒体的主导性框架确定自己的报道方向,在纷繁复杂的新闻事实中抓住若干主要属性,以便生产并建构出符合媒介框架的文本与意义。故不同的媒介组织都有各自的新闻框架,这一框架规定着媒体对新闻事件的态度和报道方式。由此观之,《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对本次雅安地震的报道分别体现了它们作为最高级别党报和全国顶尖都市报所坚持的新闻框架。

## 二、研究过程与新闻框架概貌

### (一) 样本选择

由于本次雅安地震无论是震级、造成的伤亡还是救援的难度均低于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各媒体对它的报道在中国传统的“头七”,也就是地震发生七天之后呈现出明显的衰减。因此,本文把4月21日至4月27日这7天作为研究时段,将对这7天内《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有关雅安地震的报道进行分析。

### (二) 样本观察

框架理论离不开内容分析,因此笔者根据报道主题的不同将地震报道(针对文字稿)分为10类:(1)地震灾区基本情况,包括每日灾情更新、灾区救援进展、重建进度等;(2)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反应,包括作出重要指示、亲赴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哀悼地震死难人员等;(3)官方的抗震救灾行为,即武警、解放军、医疗队等官方人员(包括党员)的救援行为与兄弟省市、政府部门的赈灾行动;(4)非官方的抗震救灾行为,包括灾区群众的自救、志愿者的救援服务、各地群众与企事业单位的捐助之举;(5)对灾区群众的直接报道,即主要报道对象为灾区群众,包括他们的遭遇、事迹、生活状态等;(6)国际社会与海外华侨的反应,包括慰问、援助、对中国抗震救灾的评价等;(7)记者的手记、日记;(8)相关政策,包括有关部门就抗震救灾下发的文件、通知等;(9)地震中出现的问题及其讨论,包括对安全隐患的报道、对争议行为的点评、对某些谣言的揭露等;(10)其他,即不能归进以上9个主题的所有报道,如对四川大熊猫、震区文物的报道。

通过对《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在研究时段内报道内容的梳理,统计得出二者这10类稿件的数量分布情况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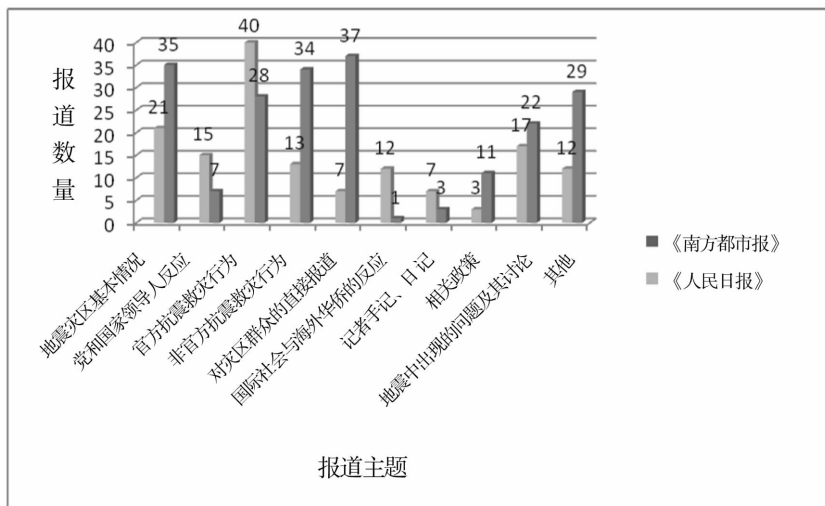


图1 《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2013年4月21—27日雅安地震报道主题分布情况

阅读图1可以发现,4月21日—27日这7天内《人民日报》报道数量最多的三类稿件分别是官方的救援行为、地震中出现的问题及其讨论和地震灾区基本情况。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应的稿件虽然只占到10.2%,但这主要由新闻事实的多少决定,毕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灾区的时间只有一天。

在本次雅安地震报道中,《人民日报》对官方抗震救灾行为的报道远远超过其他主题的报道,占报道总数的比例达到最高的27.2%。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它对外界最为关心的灾区群众的直接报道仅占到报道总数的4.8%。为了弥补文字稿上报道主题的严重失衡,《人民日报》把对灾区群众的报道主要放在了新闻图片上。在这7天的《人民日报》上,有关雅安地震的大小图片共计80张,平均每天11张,这个数字对素以严肃面孔著称的《人民日报》而言已然很大。这些图片稿极少直接展现地震的残酷,更多的是展现灾难中人性的美好瞬间和一些动人场景,例如4月22日头版最大的一幅照片题为“叔叔,喝水吧”,图为宝兴县两名儿童手拿矿泉水送给正往前赶路的救援队伍。另有很多照片报道的是灾区人民顽强自救、团结互助的画面。

研究时段内《南方都市报》对雅安地震报道数量最多的三类稿件是对灾区群众的直接报道、非官方的抗震救灾行为和地震灾区基本情况。由此可以看出灾难发生后“普通人”在《南方都市报》新闻框架中的突出地位,这里所谓的“普通人”既包括受地震伤害的震区普通百姓,也包括深入灾区进行救援服务的志愿者和灾区外积极献爱心的一般民众。

这7天的《南方都市报》上,每期至少有一个整版用来报道灾区群众,对象多为个体,或讲述遭遇、或描写场景、或记录一件小事。这些报道并不都是类似于《胡姨的爱心早饭》、《8岁男童震后徒手帮母扒出妹妹》这样充满正能量的“正面材料”,而是力求全面展现灾民和救援者的悲欢离合。如《汶川地震中的危楼这次成了废墟》反映地震对灾民生活毁灭性的打击,《再见,姐姐》直接表现亲人逝去的悲痛,《送药救灾路上女志愿者牺牲》讲述了志愿者被坠石砸中身亡的不幸。

虽然报道的是千里之外的雅安地震,但《南方都市报》依然重视本地新闻。如《粤NGO媒体人跨界联合救灾》、《广东邮政收寄爱心包裹近万件》等积极报道广东各界对地震灾区的慰问、驰援、捐助的新闻每期都至少有半个版。

### 三、两种新闻框架的比较

在框架的内在结构方面,台湾学者臧国仁将其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在每一种已经形成的事实的框架中,都有类似的结构,分别由高层、中层以及低层环节组成。框架的高层次结构是指在各种事实的内在结构中,均有高层次的意义,它往往是对某一事物的界定。框架的中层次结构系由以下几个环节组成,包括主要事件、事件背景、事件结果、事件影响、事发原因、对事件的评估等。框架的低层次结构指的是框架的表现形式,即由语言或符号组成,包括字、词、句,以及由这些基础语言所形成的修辞或比喻。”<sup>[2]</sup>

结合大陆学者的相关论述,笔者认为,新闻框架的高层次结构是从宏观上回答“这是什么”,即对整个新闻事件主题的设置;框架的中层次结构是框架的主干,包括对新闻事件主要进程的报道、新闻素材的选择和处理、对某些问题的解析和评价等;框架的低层次结构则指新闻文本的具体表达方式,包括报道所使用的字词、语气、修辞等。这三个层次互相相应,通过内在的互动建构起了完整的新闻框架。笔者将分别从高、中、低三个层次结构对《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的雅安地震报道进行比较分析。

#### (一) 高层次结构:抗震救灾——两报对地震报道主题的共同设定

虽然每一则新闻都有其主题,但重大事件发生后所有的报道都需要一个总的主题或者中心议题进行统领。因此,有学者将新闻框架的建构定义为“采取集中的组织思路,通过选择、强调、排除和精心处理等方式对新闻内容提供背景,并提出中心议题的活动。”<sup>[3]</sup>

全面考察《人民日报》对雅安地震的报道活动,可以发现这份最高级别党报的“中心议题”或整

个报道的“中心思想”集中且突出,即不屈的中国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奋力夺取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这一点从报道数量就可以看出来,地震发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反应、由党直接领导指挥的官方抗震救灾行为、能够体现中国人民团结互助精神的非官方抗震救灾行为以及以抗震救灾为旨要的相关政策等四大类稿件加起来占到《人民日报》地震总报道量的48.2%。

至于《南方都市报》,地震后第二天即4月21日的那张占了头版三分之二的新闻图片就揭示出了它的报道主题。图片记录的是一群解放军战士救出一名受伤妇女,抗震救灾的主题呼之欲出。再从报道数量上来看,能够体现这一“总主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应、官方抗震救灾行为、非官方抗震救灾行为和相关政策的稿件加起来占其报道总数的38.6%,只不过侧重点不同。

事实上,无论是按新闻规律办事还是服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党报和都市报在地震报道中都必须将党和政府领导的抗震救灾作为自己的报道主题。

## (二) 中层次结构:两报在新闻素材的呈现上差异明显

地震发生后,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和人物琳琅满目,但新闻工作者只能根据媒体的新闻框架进行选择、归类和呈现。在对雅安地震的报道中,党报和都市报新闻框架的主要差异就体现在对新闻素材的选取及最后的呈现上。

在救援过程中,网上不断传出灾区某些地方的救援物资分配不合理,微博上也流传着很多灾区孩子举着写有“缺水”、“缺药”、“缺帐篷”牌子的照片。但是,《人民日报》无论是文字稿还是图片稿都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报道。还有对汶川地震后有关建筑质量的拷问、对红十字会的质疑等内容虽然也属于雅安地震新闻报道的大序列,却没有被纳入党报在特殊时期的新闻框架。与《人民日报》规避“负面材料”、从始至终完全坚持正面的框架表述不同,《南方都市报》在以正面框架为主的同时并不回避负面问题,甚至主动予以揭露。例如《等待更多关注的天全县》暗指救灾有疏忽之处,而《芦山一副乡长被指救灾不力就地免职》这样的“负面新闻”还登上了4月25日的报纸头版。

在传统的灾难新闻报道中,媒体对受灾群众多是“集体呈现”。“这种集体视角下的灾难报道,讲究运用‘集体呈现’来肯定集体的精神和力量,导致报道格式化,缺乏个体关怀与人性温情”<sup>[4]</sup>。值得肯定的是,在本次雅安地震报道过程中,《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都很注意展现“个体关怀和人性温情”,所不同的是前者主要利用新闻图片来实现这一点,而后者则是以文字稿为主、图片为辅。

吸引媒体报道灾难事件的主要是与之相伴而来的“生”与“死”这对人类生活的宏大主题<sup>[5]</sup>。但是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读者只能见到“生”的坚强与感动,却见不到“死”的不幸与伤痛。所以从“再现”现实的角度来说,《人民日报》对地震的报道存在偏差。相反,《南方都市报》在报道如《塌墙砸中双腿,百岁老人扒砖逃生》这样“生”的新闻时并不避讳对“死”的讲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4月23日A09版以“孕妇救子”为题同时报道截然不同的两则短消息,一则是“她,喜诞一子”,而另一则却是“她,胎儿不保”。《南方都市报》关于“死”的报道保持了应有的克制,但真实地展现了地震的残酷,更能激发读者心灵的震颤。

总的来说,《人民日报》在地震报道中选择的都是积极正面的新闻素材,以突出抗震救灾的及时、高效、有序以及中国人民的坚强奋进为目的;而《南方都市报》的素材则更为灵活多元,能相对完整地展现灾区的苦辣悲喜。

## (三) 低层次结构:党报的“程式化”写作与都市报的感性笔触

新闻框架的三个层次是互相统一的,低层次的描述与高层次的主题设定、中层次的素材呈现之间共融共通。从低层次结构考察《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雅安地震报道的文本表达,可以发现前者依旧奉行“程式化”的写作,而后的写作笔触更加感性。

下面一段文字节选自《人民日报》4月23日刊登在头版的《四川抗震救灾高效有序》一文:

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作出批示,要求启动应急预案,立即派出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即刻组织当地力量就近救援。他同时强调,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压倒一切,救灾工作压倒一切。

震后不到半小时,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分别向震中雅安芦山县赶赴,沿途一边了解灾情、一边调动救援力量……

加强统一调度和协调,军队、武警、公安、消防、矿山救护、民兵预备役等救援力量到达后,第一时间被指挥部派往重灾乡镇,道路不通的,徒步前往,有的采用直升机空降。当天晚上,向所有重灾乡镇都派出了救援力量。目前,到达雅安重灾区的救援力量已有2.7万多人。

始终把救人放在第一位。灾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冲锋在前,成为群众战胜灾难、渡过难关的主心骨,组织带领群众展开救援。抓住72小时黄金救援期,争分夺秒搜救和转移群众,震后20多个小时就实现了逐村逐户搜救,从废墟中救出320多人。

……

这一段报道完全是从抗震救灾的视角来组织材料,而且行文符合党报一贯的写作模式,即将领导干部的反应或指示置前,具体的措施放在后面,而且“成绩”一般放在段尾以体现出前面措施的有效性。遣词造句“程式化”明显,如“作出批示……要求……强调……”这样的段落结构常见于各级党报。在描述灾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时用的词语是“挺身而出”、“冲锋在前”、“主心骨”,其所指意义就是灾难中党的坚强有力。

反观《南方都市报》,它的文本写作就如同其报道视野一样充满“人情味”,这体现在它感性细腻的笔触上。下面是4月22日登在《南方都市报》A09版的《汶川地震中的危楼这次成了废墟》中的文字节选:

红棉袄,白花睡裙。洪雯痴痴地望着面前的砖木,嘴里低声而重复地讲述着自己的“悲惨世界”。她背后的楼房,如今一片废墟。而楼房与废墟间的距离,只有4月20日早间剧烈震动的几十秒。

……

实际上,那一刹那摧毁的不仅是洪雯和孙婆婆家的房屋。根据灵关镇政府统计,此次地震中该镇房屋100%受损,其中近5000间无法再住人。这个常住人口1.7万人的小镇,轻伤900多人,重伤92人,死亡12人,还有1人失踪……废墟上,有黄肖未写完的作业本,有吕受琼的记账簿,也有洪雯最喜爱的脚踏缝纫机。这些躺在废墟中的记忆,成了两家人难以割舍却又难以寻回的东西。

洪雯称,自己的屋子在汶川地震后已开始裂缝,被认定为危房。“但我一个人挣钱,还得养两个孩子,哪有钱修补呀?”于是,危房变成了废墟……

这篇报道颇有小说的感染力。文章开头对主人公洪雯几句简短的描写就把一个独自抚育两子、家境清贫的妇女精神上遭受的打击给展现出来了,文中废墟上的“作业本”、“记账簿”、“脚踏缝纫机”的所指意义都是地震前的正常生活。通过记者感性的视角和细腻的描写,读者能真正感受到地震的无情与灾民一无所有之后的困顿。

## 四、总结与讨论

### (一) 对两报新闻框架的总结

通过分析《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在研究时段内对雅安地震的报道,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人民日报》坚持的是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形象框架”,而《南方都市报》主要采用的是符合市民定位的“情感框架”。

在《人民日报》的新闻框架内,从指导抗震救灾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参与救援的武警、解放军,从当地党委、政府到灾区党员,从志愿者到普通群众,每一类新闻主体都有其典型代表,他们的形象通过文字和图片得以展现,而且均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因此,《人民日报》雅安地震报道的新闻框架可称为“形象框架”。例如,它报道最多的就是官方力量的抗震救灾行动,便树立了党和政府时

刻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对抗震救灾的领导坚强有力的形象。《人民日报》视野内的灾区群众坚强乐观、团结友爱，大量的新闻图片凸显了这一形象。

《南方都市报》对雅安地震的报道虽然也将抗震救灾作为统摄整个报道实践的主题，但是与《人民日报》相比，它的新闻框架透出强烈的人文关怀和“人情味”。虽然它也塑造了党和政府积极抗震救灾的形象，但其“情感框架”的特征无疑更加突出。这主要反映在它以“平民化”视角进行新闻叙事，对有着不同悲喜命运的普通个体予以深情关注并进行大量报道。通过这些报道，读者可以比较深入地了解灾民的生活状态，感受生命的脆弱和人性的光辉，最终让自己的情感得以激发。再者，《南方都市报》让受众了解到灾难本不应被忽视的残酷无情与抗震救灾本身复杂的一面。

## （二）对两种新闻框架形成原因的讨论

《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在雅安地震报道中为何分别选择“形象框架”和“情感框架”？这一问题值得探讨。

《人民日报》“形象框架”的形成首先由它的党报属性决定。作为中国最高级别的党报，《人民日报》以传递党中央的声音、引导社会舆论、教育指导广大党员群众为办报使命。在发生地震灾难的特殊时期，它对事件主题的设定、新闻素材的选择性处理和文本生产更是体现了将舆论引导功能放在首位的党报新闻观。《人民日报》的地震报道从始至终以正面宣传为主，将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以及抗震救灾过程中的先进典型尤其是党员模范的事迹及时传达给广大受众，显示出了其高度自觉的党性意识。

对《南方都市报》而言，主要读者群是广大市民阶层，这一点决定了它必须在新闻报道中突出为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人情味”。当灾难和不幸发生后，“人情味”更要被进一步强化以迎合受众的情感需求。《南方都市报》正是奉行了这一方针，才把对灾区群众的直接报道放在雅安地震报道的首位。如果说党报的自身定位和政治使命决定了它必须对新闻素材进行更为严格的“选择性处理”和“意义化包装”，那么对都市报而言，政治宣传不是办报的主要目的，因此它对抗震救灾行为的报道不需要刻意凸显官方视角。

从新闻操作的层面上来看，包括灾民、志愿者、广大灾区外的民众及企事业单位在内的民间力量的新闻主体更为多元，可报道的角度更加丰富，也更容易被纳入《南方都市报》的“情感框架”，因此含有政治宣传价值的官方抗震救灾行为的报道就被相对“弱化”了。另外，新闻价值中的接近性因素也深刻影响到了《南方都市报》的新闻框架。总之，这份品牌都市报的新闻框架是以人为本的开放性报道模式，在呈现新闻素材时对新闻价值和信息的多层次性重视程度更高。

新闻框架中，“叙事角度及新闻素材的取舍，在很大程度上也隐含着媒体的意识形态性”<sup>[6]</sup>。在我国，无论党报还是都市报都服从、服务于同一种意识形态。因此，《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对雅安地震的报道互相区别又互相补充，二者的结合能够为受众建构一个相对完整的关于雅安地震的“现实”。

## 参考文献：

- [1] Goffman E. *Framing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4: 21.
- [2] 臧国仁. 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 [M]. 台北: 三民书局, 1999: 51.
- [3] [美] 沃纳·塞弗林, 詹姆斯·坦卡德. 传播理论: 起源、方法与应用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312.
- [4] 董天策, 蔡慧. 我国灾难新闻报道模式的转变与突破——以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J].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2009 (4).
- [5] 赵振宇, 胡沈明. 玉树地震: 中国进入后灾难报道时期 [J]. 新闻与写作, 2010 (5).
- [6] 陈新勇, 张红霞. 中西媒体“三鹿奶粉”事件报道框架及意识形态性 [J].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 2009 (1).